

农民工汇款水平及其内生影响因素

——基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

熊德平, 范维维

(宁波大学商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基于宁波市 552 名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 运用区间回归模型, 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对农民工汇款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农民工每月汇款水平主要在 1 000 元以下; 汇款额随年龄的增加呈“ \cap ”型分布; 高中及中专学历汇款水平最高; 西部地区汇款额略多于中、东部。第二产业汇款水平略高于第一产业; 合同工汇款最少; 人口负担率越高, 汇款水平越高。性别变量正向影响显著, 男性的影响系数为 137.896; 户籍所在地负向影响显著,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50.035、-266.891; 就业领域正向影响显著, 第二产业的影响系数为 101.665; 就业方式正向影响显著, 自营的影响系数为 262.255; 外出务工比例、家庭就业人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366.999 和-50.502, 负向影响显著。年龄、文化程度、现职工作年限、总工作年限、人口负担系数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农民工; 汇款水平; 人力资本; 就业; 宁波

中图分类号: F842.6;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4)06-0080-06

Remittance level of farmer workers and its endogenou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point of human capital and employment

XIONG De-ping, FAN Wei-wei

(Business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y constructing ordered probit model with known threshold values about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remittance level of famer workers from the point of human capital and employment situation is made in the paper based on the survey of 552 famer workers working in Ningbo.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most of the farmer workers remitted below 1 000 yuan each month, and the amount of remittance showed a \cap -shaped with the worker's age growing. Farmer workers with high school or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did a better job in remittance than others. Farmer workers in western region remitted more than those from middle and eastern areas. The farmer workers working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remitted more than those working in third industry. Contract workers did a worse job in remittance. The higher of the dependency rate, the more remittance needed. The variable of gender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and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male was 137.896. The place where farmer worker's residence registered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and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that for the middle and west were -250.035 and -266.891 respectively. The employment field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and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secondary industry showed 101.665. The way of obtaining employment had positive effect, and the coefficient of self-employment showed 262.255. The egress laboring and employment figures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and the coefficient of egress laboring and family employment figures showed -366.999 and -50.502 respectively. Effect of following factors including age, education degree, current work life, total work life and dependency rate were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famer workers; remittance level; human capital; employment; Ningbo city

收稿日期: 2014 - 08 - 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14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47、11&ZD141); 宁波大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重大招标项目(QYJYD1103)

作者简介: 熊德平(1962—), 江苏东台人, 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发展理论与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已成为中国社会发 展进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1]。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截止 2013 年, 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 2.69 亿人^①。农民工外出务工时所形成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产生了庞大的汇款金融服务需求, 现有

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虽已呈现多元化，但为农民工量身提供的金融服务略显滞后。这导致农民工对金融机构的信任不足、认知落后等问题凸显^②。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汇款^③的研究，侧重汇款的动机和作用方面，部分学者研究了农民工汇款水平的内在决定因素。白南生^[3]、蔡旭^[4]、罗芳^[5]、李强^[6]、明娟等^[7]分别选择不同内生变量，研究其对农民工汇款水平的影响。上述研究所考虑的内生变量涵盖范围较广，各自在就业特征、家庭情况等方面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拓展，但未合理归类。胡枫^[8]、胡枫^[1]、明娟^[9]等将内生变量归类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三个方面，形成了关于农民工汇款水平内在决定因素的分类系统。在此基础上，笔者基于经典行为金融学理论，从人力资本、就业状况两个视角，选择区间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的汇款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一、研究视角与变量选取

按照经典行为金融学理论，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不仅是其经济利益刺激的直接映射，而且其中也反映着行为者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以及对信息的判断能力等^[10]。据此，农民工的汇款行为也相应地能反映出其价值观念、对自身金融行为的认知和对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判断能力等，而人力资本以及就业状况就是形成这些观念、能力的最基本决定因素。因此，从人力资本和就业状况视角考察汇款水平影响因素可以视为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具体应用。

在假设外部影响因素(政府政策等)不变的情况下，将农民工汇款水平的内生影响因素分为人力资本和就业状况两方面。

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农民工人力资本为个人所拥有的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各种特质，并强调人力资本是随时间而变化的^[11]。本文将人力资本分为直接(先天)与间接(后天)两部分来衡量。其中，性别、年龄与户籍所在地构成了直接衡量人力资本的三个方面，也即农民工先天获得的人力资本；而教育程度、现职工作年限和总工作年限构成了间接衡量人力资本的三个方面，即农民工经过后天努力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并随着时间而变化。为刻画年龄与汇款之间可能存在的“U”型曲线关系，引入“年龄的平方”这一解释变量，以使变量选取更为科学。

就业状况是指农民工的工作情况，既包含农民工目前自身的工作情况，如就业领域、就业方式等，也包括家庭对其工作情况的影响。据此可将就业状况具体分为内在与外在两部分影响因素。就业领域、就业方式构成内在因素，即农民工自身选择的就业状况；家庭就业人数、人口负担系数、外出务工比例构成外在因素，即农民工所在家庭对其就业状况的影响。人口负担系数是指农民工家庭中单位劳动力所需要负担的非劳动力人数，即人口负担系数=非劳动力人数/劳动力人数。而外出务工比例则是农民工输出地所在家庭中，外出务工的人数所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即外出务工比例=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总人数。

表 1 为模型解释变量说明。人力资本包括农民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现职工作年限、总外出务工年限、户籍所在地^④等 6 个方面。就业状况包括农民工就业领域、就业方式、人口负担系数、外出务工比例、家庭就业人数等 5 个方面。

表 1 模型解释变量说明

序号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方差	类型
人力资本					
x_1	性别	女=0, 男=1	0.76	0.18	虚拟变量
x_2	年龄	取实际年龄	36.57	80.16	连续变量
x_3	年龄的平方	取实际年龄的平方	1 417.56	456 709.00	连续变量
x_4	文化程度(以小学及小学以下为对照组)	初中:是=1, 否=0	0.50	0.25	虚拟变量
		高中及中专:是=1, 否=0	0.18	0.15	虚拟变量
		大学及大专:是=1, 否=0	0.05	0.04	虚拟变量
x_5	现职工作年限	取实际目前就职的工作年限	5.35	23.88	连续变量
x_6	总工作年限	取实际总工作年限	11.53	45.55	连续变量
x_7	户籍所在地 (以东部为对照组)	中部:是=1, 否=0	0.44	0.25	虚拟变量
		西部:是=1, 否=0	0.47	0.25	虚拟变量

续表

序号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方差	类型
就业状况					
x_8	就业领域	第二产业=1, 第一产业=0	0.70	0.21	虚拟变量
x_9	就业方式(以合同工为对照组)	临时工:是=1, 否=0 自营:是=1, 否=0	0.34	0.22	虚拟变量
x_{10}	人口负担系数	非劳动力人数/劳动力人数	1.35	1.98	连续变量
x_{11}	外出务工比例	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家庭总人数	0.32	0.03	连续变量
x_{12}	家庭就业人数	取实际就业人数	3.22	1.73	连续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2013年宁波市“农民工金融行为”的问卷调查。选择宁波的理由是:第一,宁波市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展较为迅速的港口城市,也是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聚集的地区;第二,宁波市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很多优惠政策,交通便利,所辖地企业数量较多,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能吸引大批务工人员;第三,出于时间和成本考虑,选择该地区有利于对受访对象进行深入访谈。本次问卷调查走访了宁波市7个农民工居住地较为密集的社区,运用抽样调查方式,采取访谈形式对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以确保问卷的完整性与可靠性。涉及汇款的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与收支状况、汇款金额、汇款途径等。调查共发放6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52份,问卷有效率为92.00%。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发放问卷过程中,采用让被调查者填写汇款区间,而不是填写具体汇款数额的方法以使得问卷回收率提高,避免被调查者不愿回答涉及隐私的相关问题或者随意填写等情况,这样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农民工汇款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所获得的数据包括了左截尾数据(left-censored observations)、右截尾数据(right-censored observations)和区间数据(interval observations)。并且,农民工汇款也有可能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使用区间数据比点数据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各组汇款水平^⑤分布如表2所示。552个样本中,“1000元以下”468份,占总样本量的84.78%,这与李强等研究结论年汇款水平10000元以下占全部样本的85.82%,大体相吻合^⑥。

表2 农民工各组汇款水平的分布

每月汇款金额分组	样本量	样本占比/%	累计占比/%
500元以下	279	50.54	50.54
500~1000元	189	34.24	84.78
1000~3000元	73	13.22	98.01
3000~5000元	8	1.45	99.46
5000元以上	3	0.54	100.00
合计	552	100.00	

表3所示的是人力资本与农民工汇款水平的分布表:男性农民工人数大约是女性的三倍,两者每月汇款水平主要在1000元以下;年龄分布呈明显的“ \cap ”型,每一区间汇款额随着年龄的增加也呈“ \cap ”型分布;文化程度与汇款水平并未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最高,达49.64%,高中及中专文化的汇款水平最高;62.68%的农民工现职工作年限为“ ≤ 5 年”,汇款水平随着年份增加呈“ \cup ”型,在“ > 10 年”这一档汇款水平最高;50.79%的农民工总工作年限集中在“ > 10 年”,但汇款水平在总工作年限“ > 5 年”开始保持平稳;来自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略多于中部,东部最少,仅占8.70%。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汇款水平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从表4可以看出,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比例最高,达68.38%,第二产业汇款水平略高于第一产业;在就业方式选择上,55.24%的农民工是合同工,汇款最少。选择自营的农民工最少,仅11.55%,但其汇款水平最高;人口负担系数方面,人口负担率越高,汇款水平就越高;外出务工比例 ≤ 0.5 的农民工占全部人数的82.25%,汇款水平远高于外出务工比例较高的农民工;家庭成员就业人数多数在3人及3人以上,汇款水平也较高。

表 3 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其汇款水平

人力资本		占比/%	汇款水平				
			500 元以下	500~1 000 元	1 000~3 000 元	3 000~5 000 元	5 000 元以上
性别	男	75.72	200	149	59	7	3
	女	24.28%	79	40	14	1	0
年龄	20 岁以下	2.17	4	7	1	0	0
	21-30 岁	25.36	62	49	25	3	1
	31-40 岁	39.49	112	77	23	4	2
	41-50 岁	28.08	82	51	21	1	0
	50 岁以上	4.89	19	5	3	0	0
文化程度	小学及小学以下	27.17	84	43	21	0	2
	初中	49.64	133	105	32	4	0
	高中及中专	18.48	52	29	17	3	1
	大学及大专	4.71	10	12	3	1	0
现职工作年限	≤5	62.68	177	117	44	7	1
	5~10	22.10	61	48	12	0	1
	> 10	15.22	41	24	17	1	1
总工作年限	≤5	22.10	64	45	13	0	0
	5~10	25.18	59	57	18	3	2
	> 10	52.72	156	87	42	5	1
户籍所在地	中部	44.20	119	157	34	5	0
	西部	47.10	136	88	35	0	1
	东部	8.70	24	15	4	3	2

表 4 农民工就业与其汇款水平

就业状况		占比/%	汇款水平				
			500 元以下	500~1 000 元	1 000~3 000 元	3 000~5 000 元	5 000 元以上
就业领域	第二产业	68.38	189	132	57	4	3
	第一产业	31.62	94	62	18	4	0
就业方式	合同工	55.24	158	111	38	3	1
	临时工	33.21	91	65	29	1	1
	自营	11.55	32	19	9	4	1
人口负担系数	≤1.5	63.77	184	123	36	7	2
	> 1.5	36.23	95	66	37	1	1
外出务工比例	≤0.5	82.25	221	158	65	8	2
	> 0.5	17.75	58	31	8	0	1
家庭就业人数	1	6.70	14	15	8	0	0
	2	23.19	61	44	20	2	1
	3	35.14	97	66	27	3	1
	≥4	34.96	107	64	18	3	1

三、实证结果及政策含义

在参考胡枫^[8]、明娟^[12]等人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权衡现有区间数据处理方法的利弊和考虑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选择区间回归模型，即使用已知门槛值的有序概率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民工汇款水平影响的方程如下：

$$REMIT = \beta_0 + x_1\beta_1 + x_2\beta_2 + \varepsilon \quad (1)$$

x_1 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向量(包括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现职工作年限及总外出务工年限)， x_2 为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特征向量(包括就业领域、就业方式、人口负担系数、外出务工比例、家庭就业人数)。区间估计模型如下：

$$REMIT_i = \beta_i x_i + \varepsilon_i, \quad \varepsilon_i | x_i \sim N(0, \sigma^2) \quad (2)$$

其中 l_i $REMIT_i$ u_i ， i 表示区间数。 $l_i \sim -\infty$ 因

变量为左截尾数据, $u_i \sim +\infty$ 因变量为右截尾数据。在给定 l_i 和 u_i 的情况下, $REMIT_i$ 在给定 x_i 的前提下的概率等于截取区间 $(0, l_0]$ 、 $[l_i, u_i]$ 、 $[u_0, +\infty)$ 的概率, 其中 l_0 、 u_0 分别表示为左侧截尾和右侧截尾断点值。

$$P(REMIT_i, l_j, u_j) = P(l_j - \beta_i x_i \leq \varepsilon_i \leq u_i - \beta_i x_i) \\ = \Phi\left(\frac{u_i - \beta_i x_i}{\sigma}\right) - \Phi\left(\frac{l_i - \beta_i x_i}{\sigma}\right) \quad (3)$$

从而得到 $REMIT_i$ 在给定 x_i , l_i , u_i 的前提下的密度函数:

$$f(REMIT_i | x_i, l_j, u_j) = \begin{cases} \Phi\left(\frac{l_0 - \beta_i x_i}{\sigma}\right), & REMIT_i \in (0, l_0] \\ \Phi\left(\frac{u_j - \beta_i x_i}{\sigma}\right) - \Phi\left(\frac{l_j - \beta_i x_i}{\sigma}\right), & REMIT_i \in (l_i, u_i] \\ 1 - \Phi\left(\frac{u_0 - \beta_i x_i}{\sigma}\right), & REMIT_i \in (u_0, +\infty) \end{cases} \quad (4)$$

对每个观测的密度函数取对数并求和, 记为 $L(\beta, \sigma)$, 对此似然函数求最大值, 对应求出 β 和 $\hat{\sigma}$ 。

表 5 为区间回归模型下农民工汇款水平的实证结果。在人力资本方面, 男性通过了 5%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与女性相比, 男性对汇款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回归系数为 137.896, 表明男性比女性月均汇款约多 178 元。这可能是因为男性负担全家生计的传统观念仍居主导地位, 同时由于男性在工作上的优势, 薪资也较女性高。户籍所在地位于中部和西部分别通过了 5% 和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与户籍地位于东部的农民工相比, 户籍地位于中部、西部对其汇款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 系数分别达 -250.0346 和 -266.8913, 表明农民工每月汇款水平受户籍所在地影响较大, 中部地区农民工每月汇款比东部地区农民工少 250 元, 而西部则少 266 元。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由于存在较多人口大省, 每户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员较多, 因此平均每人负担的汇款额度相对较小, 同时也可能是因为相较于中西部, 东部家庭生活成本较高, 需要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地汇款回家以贴补家用。文化程度、现职工作年限和总工作年限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可能是因为当今农民工所从事职业所需技能要求普遍较低, 技能准入门槛低, 生活阅历、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未能有效体现在工作过程中, 对薪资水平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也就无法提升汇款水平。

表 5 农民工汇款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z 值
人力资本 性别	137.896**	2.16
年龄	1.769954	0.09
年龄的平方	-1.019832	-0.38
初中	-63.62591	-0.94
高中及中专	-12.24007	-0.14
大学及大专	-9.279491	-0.06
现职工作年限	4.25111	0.69
总工作年限	-9.153604	-0.19
中部	-250.0346**	-2.52
西部	-266.8913***	-2.65
就业状况 就业领域	101.6653*	1.66
临时工	65.91033	1.11
自营	262.255***	2.92
人口负担系数	-32.15146	-1.15
外出务工比例	-366.9985*	-1.85
家庭就业人数	-50.50172*	-1.88
常数项	1 082.301**	2.50
Prob > chi2=0.0017	LR chi2(18)=37.62	
Log likelihood =	-828.97928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在就业状况方面, 第二产业通过了 10%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与第一产业相比, 选择第二产业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系数为 101.6653, 表明于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每月比就业于第一产业的农民工多汇款回家 101.67 元。自营通过了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与合同工相比, 选择自营对汇款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系数为 262.255, 表明自营的农民工比合同工每月多汇款回乡 262.26 元, 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合同工形式, 自营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稳定性, 也即有利于汇款水平的提高。外出务工比例、家庭就业人数均通过了 10%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外出务工比例的上升、家庭就业人数的增加对汇款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系数分别为 -366.9985 和 -50.50172, 表明外出务工比例每增加 1, 每月汇款水平降低 367.00 元; 家庭就业人数每增加 1 人, 每月汇款水平降低 50.50 元。这可能是因为一个家庭外出务工人员越多, 所占比例越大, 假设每个家庭所需汇款总额相同, 那么平均每位家庭成员所负担的家庭经济压力就越小, 因而汇款水平越低。

综上, 相对于女性, 男性农民工对汇款水平影响系数为 137.896, 正向影响显著; 相对于户籍所在地位于东部的农民工, 中部和西部地区对汇款水平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250.035、-266.891, 负向影响

显著；相较于第一产业，选择第二产业工作对汇款水平影响系数为 101.665，正向影响显著；与合同工相比，选择自营对汇款水平影响系数为 262.255，正向影响显著；外出务工比例、家庭就业人数对汇款水平影响系数分别为-366.999 和-50.502，负向影响显著；年龄、文化程度、现职工作年限、总工作年限、人口负担系数影响并不显著。

上述结论表明，若要提高提高农民工的汇款水平，第一，注重女性农民工群体的金融知识普及。因为，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正规汇款途径(邮局以及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在宣传金融知识时，应更多地关注女性农民工对金融服务的了解。第二，制定针对中、西部地区户籍农民工的倾向性汇款便利服务，如更低廉的汇款手续费用等。第三，政府可以提供优惠性政策鼓励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从而有利于增加汇款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发展；第四，金融机构可以考虑在为以自营形式就业的农民工提供汇款服务的同时，鼓励其使用其他种类的金融服务(信贷、保险等)，将其引入新的金融服务系统中。

注 释：

-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 ② 农民工宁愿自己携带现金回家也不愿使用金融机构汇款回家，充分显示了农民工对金融机构的信任不足和认知落后等问题。农民工携带现金回家过年“钱没了”的新闻不断，有被偷被骗的、有不小心遗失的。还有的农民工因为携带现金神经太过紧张，火车坐过站甚至在路途上晕倒。
- ③ 在此特别指出，本文的“汇款”一词，采用了李强(2001)的解释，即泛指农民工寄回和带回家乡的钱，同时这也与国际学界在此问题研究上的“remittance”一词也可以对应，并不仅指通过邮局等金融机构带回家中的钱。
- ④ 本文所指东部地区包括浙江省、江苏省、河北省、福建省以及山东省；中部地区包括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以及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包括云南省、

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以及新疆自治区。

- ⑤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按照月汇款水平统计。
- ⑥ 李强、毛学峰、张涛(2008)所使用的数据口径是年，本文所使用的是月，但将数据折合成月汇款量后，百分比与本文大体相符。

参考文献：

- [1] 胡枫，史宇鹏，王其文．中国的农民工汇款是利他的吗——基于区间回归模型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8(1)：175-190．
- [2] 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4)：64-76．
- [3]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64-78．
- [4] 蔡旭，张义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汇款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 2005 年厦门调查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12)：77-81．
- [5] 罗芳．外来农民工家乡汇款的影响因素及动机分析——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7(S1)：49-56．
- [6] 李强，毛学峰，张涛．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8(3)：2-12．
- [7] 明娟，张建武．回流意愿、迁移成本与农民工汇款——一个区间回归模型分析[J]．南方人口，2011(1)：48-56．
- [8] 胡枫，王其文．中国农民工汇款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区间回归模型的应用[J]．统计研究，2007(10)：20-25．
- [9] 明娟．外出农民工特征变量及行为抑制：从汇款动机生发[J]．改革，2011(3)：82-88．
- [10] 王国伟．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金融行为研究[J]．学术研究，2011(10)：47-52．
- [11] 孙继，杨晓江，岳松．OECD 的人力资本观、测量指标及启示[J]．辽宁教育研究，2008(12)：103-106．
- [12] 明娟，张建武．人力资本积累、搜寻渠道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区间回归分析[J]．西北人口，2011(3)：48-52．

责任编辑：陈向科